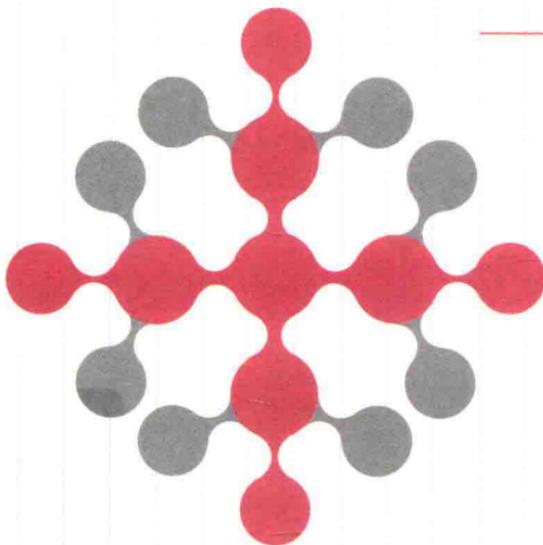


同济人文社科丛书(第四辑)

丛书主编 江波

女性修辞研究

谢元春 著



出版社

同济人文社科丛书(第四辑)

丛书主编 江波

女性修辞研究

谢元春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研究汉文化背景下的女性修辞的专著。作者对于女性修辞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共时与历时相结合的审视，首次提出了女性修辞的基本原则，在词语和句子两个层面上探讨了女性修辞的修辞表现与修辞特点，总结了女性修辞所建构的美学特征，并关注了女性修辞的和谐价值，对于当代社会女性修辞如何更有效地发挥其价值进行了探讨。语料丰富，论证合理，富于创新，学术性与可读性兼备，适合语言学、修辞学等相关方向的研究者们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性修辞研究 / 谢元春著. --上海 :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4.9

(同济人文社科丛书. 第4辑)

ISBN 978-7-5608-5605-6

I. ①女… II. ①谢… III. ①汉语—修辞—研究
IV. ①H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96330 号

女性修辞研究

谢元春 著

责任编辑 徐国强 责任校对 徐春莲 封面设计 张微

出版发行 同济大学出版社 www.tongjipress.com.cn
(地址:上海市四平路 1239 号 邮编:200092 电话:021-65985622)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同济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8
字 数 215 000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8-5605-6

定 价 28.00 元

序

可以这样说，人类自有语言开始，就有修辞活动的发生。道理非常简单，因为每个人用语言表情达意（包括后来以记录语言的符号体系文字写作），都会有一种锐意进取的情感冲动，这就是如何将情感或思想表达得尽可能的圆满，从而提高言语交际的效果。我们都知道，要想提高言语交际的效果，使交际目标得以实现，就要考虑说话的技巧，写作的策略。而说话或写作时考虑表达技巧和策略，这便是修辞。只要是思维正常的人，总是希望自己表达的思想观点被他人认同，自己倾诉的情感使他人产生共鸣并予以深切理解或同情。而要达到这样的目标，表达者如果不极尽“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在创意造言方面有所努力，那是不可能臻至的。

事实上，每一个思维正常的人，只要不是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而是生活在滚滚红尘之中，融入于人世社会之内，就要与人交往，与人合作。而无论是交往还是合作，都必须通过言语交际来实现信息的交换、思想的交流、情感的展露，从而达到相互理解，协同行动，以期完成预定的工作目标。但是，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我们若是留心观察，就会发现，在人际互动的言语交际过程中，男性与女性在思想的表达、情感的展露方面存在着方式上的差异。这种表达方式上的差异，我们可以称之为“修辞的性别分野”。

所谓“修辞的性别分野”，并不是指修辞本身分性别，而是指男女不同的性别在修辞方式的选择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种因为性别上的差异而导致的修辞方式的差异，便是本书所立意的“修辞的性别分野”。作为一种客观的语言现象，“修辞的性别分野”就像人类自有语言以来便有修辞一样，是一种自然而正常的现象。男性与女性不仅在生理上有差异，而且在心理上也有差异，这是不争的客观事实。特别是在中国这样具有灿烂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度，由于儒家思想数千年对人们思想的深刻影响，强调“男女有别”的意识对于造就中国女性（特别是汉民族女性）不同于男性的心理与行为方式（包括言语方式，因为“言语”也是一种“行为”）有着直

接而巨大的作用。正是由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汉语修辞中的性别差异就显得相当突出。这种差异,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修辞的性别分野”,虽然明显存在,但是由于长期以来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现实造就的以男性为中心的修辞观,将这种差异忽视了。只有到了女性独立意识强化了,站在男女平等的角度来反观男女在语言行为上的差异,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男女在修辞表现上也有差异的,男女修辞上的分野就像男女性别上的分野一样明显。应该说,男女在修辞方式上的差异虽然不大,但细微处的差异却是明显的。比方说,听到一件喜讯,男人会说:“太高兴了!”女人则大多会说:“太高兴啦!”也许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觉得这两句话并没有什么差异。但是,若是细心且对语言表达敏锐的人,则会发现其中的细微差异。男人用的语气词是“了”,女人用的是“啦”。这表面看起来是语法现象,实则是修辞现象。因为二者的差异是不能从语法结构上分析出来的。上面我们说过,无论是“了”或“啦”,在上面二句中都有一种表达说话者态度的附加意义,这附加意义便是语法之外的“修辞意涵”。从语感上来看,只要是母语为汉语的人,都能感觉得出“了”作为语气助词,表达的是说话者个人的情感态度,有“仅此而已”之意。而“啦”,则附加有一种欲与他人分享、表达集体认同的情感态度,有“我们”都有此情感态度之意。那么女性为什么会有这种微妙的心理呢?这与汉民族女性长期以来处于从属地位的现实有关,是客观社会现实造就了女性不独立、不自信的心理,因而她们的观点或态度往往需要别人认同。又比方说,同样是要求孩子做一件事,作为男性的父亲与作为女性的母亲,他们的说法就有差异。父亲最可能这样说:“小明,把我的拖鞋给拿过来!”母亲则最可能这样说:“小明,把妈妈的拖鞋拿过来,好吗?”这两句从语法上看,同属于祈使句,但说话的口气明显不同,前者是命令式,后者是请求式。口气不同,情感态度就不同。而情感态度不同,对于接受者来说,心理感受也不同。这样,就直接导致了言语交际中接受效果的差异。如果表达者说话的口气柔和客气,接受者就易于感受到其善意友好的情感态度,那么在言语交际中就会乐于与表达者合作,接受其观点或请求。反之,接受者则不乐于与表达者合作,拒绝其观点或请求,即使迫于不得已的外在压力而勉为其难,心里也极不愉快,这对表达者与接受者今后的言语交际与人际

沟通是有负面影响的。

言语交际是个复杂的问题,说写的细节往往决定其成败。因此,在言语交际中,尤其是在异性之间的言语交际中,重视“修辞的性别分野”,从细微处着眼,重视分析交际者遣词造句的微妙之处,把握交际者的情感态度,对于顺利完成预定的言语交际目标是有积极意义的。然而,对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不仅绝大多数语言使用者没有察觉,就是以语言敏感度较高自居且以语言研究为职业的语言学家与修辞家们,也没有认识到语言活动中客观存在的“修辞的性别分野”,以致对于修辞中许多难以解释的修辞现象都无法从理论上予以圆满说明,当然就更没有人能从男女性别的视角观察、分析、研究“修辞的性别分野”问题,从而指出男女两性在修辞表现上的差异,总结概括出两性修辞的具体规律。至于从女性的视角切入,对女性修辞这一课题进行深入研究,更是没有人会想到。正因为如此,对于“修辞的性别分野”问题,特别是女性修辞研究,在汉语修辞中几乎是一片空白。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看,这是中国修辞学研究的重大缺憾,是急需填补的学术空白。唯有如此,汉语修辞学研究才能得以深化,汉语修辞学的体系才能健全,汉语修辞研究才能真正面向汉语发展的实际,总结出相关的修辞规律,对人们的语言实践予以指导。

令人欣喜的是,在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发展走过一百余年的历程后,新生代的学者谢元春博士终于敏锐地发现了汉语修辞研究的上述缺憾,开始以极大的学术勇气走向这片亟待开垦的学术荒原,最终伐荆烧畲,收获了辛勤耕耘的第一桶珍贵的“谷物”。这桶珍贵“谷物”,就是她精思傅会、历时六载完成的学术专著《女性修辞研究》。

《女性修辞研究》一书,共分八章。第一章“绪论”部分,既有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学术综述,也有本书研究思路、方法、材料等的说明,同时还着重论述了“女性修辞研究”这一研究课题的意义。第二章“女性修辞概说”,主要讲了两个问题:一是“女性的‘性别’内涵”;二是“影响女性修辞的因子”。认为“女性的‘性别’内涵”应该包括“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两个方面,认为“影响女性修辞的因子”包括关键因子“性别”与重要因子“地域”、“时代”、“具体语境”。第三章“女性修辞原则”,主要论述了两个问题,一是女性修辞的两大原则;二是女性在遵守两大原则时的层次性。

第四章“语气词的使用：修辞原则制约下的女性修辞表现之一”，是通过女性修辞中语气词的使用考察与定量统计分析，以“解剖麻雀”的方式，对女性在语气词使用方面的具体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并以数据统计的方式得出确凿的结论。第五章“句类的使用：修辞原则制约下的女性修辞表现之二”，是通过对女性修辞中句类使用情况的考察与定量统计分析，在与男性修辞中句类使用情况进行对比中，归纳总结女性修辞在句类使用上的特点与规律。第六章“‘阴柔’之美：修辞原则制约下女性修辞建构的美学特征”，主要是探讨女性追求阴柔之美与汉民族文化的关系，总结概括女性修辞“阴柔”之美的构成因子，论证女性修辞阴柔之美的时代性。第七章“和谐价值：修辞原则制约下的女性修辞价值追求”，主要探讨了三个重要理论问题：一是“女性修辞的价值何以被误解与被忽视”；二是“女性修辞的价值认识”；三是“当代女性修辞如何实现和谐价值最大化”。第八章“结语”部分，则是对相关理论问题的申足，对未竟研究论题进行了前瞻性的思考。

前文我们说过，女性修辞是“修辞的性别分野”研究中的一个最重要也是最薄弱的研究环节。但是，长期以来却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作者谢元春博士作为新生代的学者能够独具慧眼地发现这个问题的重大学术价值，这本身就值得称道。学术界有一句行话：“好的选题，是成功的一半。”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好的选题一般都是学术界亟待开拓的新研究领域，是学术研究得以继续向前推进与深化的助推器。事实上，任何一门学术研究的发展，都是与新领域的拓展分不开的。而这新领域的拓展，往往都与好的选题有关，是那些独具慧眼的研究者的功劳。当然，我们称道谢元春博士的专著《女性修辞研究》，并不仅仅是因为它选题新颖有价值，而是它在女性修辞研究的许多关键问题上确实有较深入的研究与拓展，使汉语女性修辞研究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对深化汉语修辞学研究、拓展汉语修辞学研究新空间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客观地说，女性修辞研究是一个宏大的研究计划，不是一人在短时间内以一本学术专著的形式就能完成的。因为这一课题实际要涉及的理论问题很多，需要探讨的具体问题也很多。因此，要发凡起例对女性修辞问题进行研究，势必首先要解决几个重要的也是基本的问题。一是建立一

个合理的理论框架；二是选择好一个可行的研究视角与路径；三是确立一个科学的研究方法。如果不能解决这三个问题，“女性修辞研究”这座大厦就无法拔地而起。令人欣慰的是，谢元春博士的《女性修辞研究》一书基本解决了这三个问题。

在理论框架建构方面，该书的理论贡献有三点：一是从理论上确认了女性修辞研究的学术价值以及对于整个修辞学科理论体系完善的意义。作者认为：“女性对话语表达方式的选择与调适（即‘女性修辞’），是与女性这一性别主体的特征密切关联的。因此，通过对女性修辞的研究，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女性独特的生理与心理特征，而且可以通过探讨女性修辞的成因，了解女性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接受了什么样的社会文化定位；通过认识女性修辞的价值，可以更直观地把握女性修辞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进而深刻地指出：“女性修辞是记录与女性有关的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因此，女性修辞的研究，对于女性了解和认识自己，以及认可自身的价值，都是有理论与实践意义的，而这正是女性学研究所要实现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完全可以说，女性修辞的研究确实有助于女性学研究目标的实现。”这个说法，乍一看似乎有些夸张，但若放到整个女性学研究的大背景中观察，则丝毫没有言过其实的嫌疑，而是既恰当又符合实际的见解，真切地凸显了作者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深刻的思辨能力。对于女性修辞研究之于修辞学理论体系完善的意义，作者指出：“女性与男性同为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孪生细胞，其价值应该是等值的。如果说在古代女性的价值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得到充分展示出来的话，那么在现代特别是当代社会，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当代女性的价值已经远远不止于繁衍后代这一生理功能，而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生活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伴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与在社会生活中作用的不断彰显，女性修辞的价值及其影响力也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并认可。因此，女性修辞作为男性修辞的对应面，是一个非常广阔的研究视域，理应包括在修辞学体系之内。如果我们的修辞学研究不关注这一部分，那就无法真实地反映人类修辞的实际。换言之，女性修辞的研究不仅具有语言实践上的意义，更有完善修辞学研究体系的理论意义。”这个观点，应该说是比较中允的，符合修辞学研究最起码是汉语修辞学研究的实际。至于这一研究的实践意

义,作者则敏锐地联系到今日中国社会的真实需要,认为“女性修辞的研究,对探讨如何构建和谐社会的途径有一定的理论启发意义”。作者指出:“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成功的言语表达方式,能有效推进交际的顺利进行,从而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反之,失败的言语表达方式则是现实生活中阻碍和谐的人际关系建立的重要因素。而成功的言语表达方式如何创造,则和修辞密切相关。因此,从实践上看,从修辞学的角度来探讨社会和谐的实现途径是可行的;从理论上讲,修辞学研究为建立和维护一个社会的和谐而发挥出它应有的积极作用,也是应有的题中之意。”这一见解超出了一般学者“为语言研究而语言研究”的思维模式,体现了语言学包括修辞学研究为现实社会服务的人文关怀,表现了新生代学者直面现实人生的学术勇气。二是提出了女性修辞的两个基本原则,这便是“求谐”原则与“柔化”原则。认为女性修辞中的“求谐”原则,既是中国“忍”文化传统的投射,也是中国传统“礼”文化精神的传承,同时还是儒家思想始终倡导的“和”文化价值的实践;认为女性修辞中的“柔化”原则,既是汉文化宗法制度对于女性的伦理要求,也是中国传统的“阳刚阴柔”哲学观在日常语言生活中的实践。这两个原则具有高度概括性,是作者经过长期思辨与对女性修辞进行深入研究后而得出的结论,相当有新意,具有鲜明的学术创新色彩。说它是对女性修辞研究的一大理论贡献,亦不为过。三是对当代女性修辞如何实现和谐价值最大化问题的思考,有一定的深度,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对于今后女性修辞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推进有理论启发意义。

在研究视角与路径方面,作者的选择可谓相当明智,这也是该书在女性修辞研究方面能够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关键原因。前文我们说过,女性修辞研究是一个相当宏大的研究计划,非一人一时所能完成。如果不选择好研究视角与路径,有的放矢地对一些重要问题展开集中而深入的研究与探讨,而是面面俱到,对女性修辞所要涉及的各个方面都要照顾到,其结果必然犹如蜻蜓点水,所论述的诸多方面均不能深入,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与权威性就要大打折扣了。这一点,其实是学术研究的大忌。令人欣慰的是,谢元春博士对于这个问题处理得非常好,她以女性观察问题的细腻与独具的慧眼,敏锐地发现了女性修辞中语气词与句类使用现象的

特异性,进而以此为观照与研究女性修辞的视角与路径。通过对男女两性说写表达中对语气词、句类的不同运用情况的抽样调查与定量统计分析,以确凿的数据说话,客观而直观地呈现了女性修辞的根本特点,总结归纳出女性修辞的规律。如本书第四章第二节“女性在语气词使用上的修辞表现及修辞学阐释”,通过对明代小说《金瓶梅》、清代小说《红楼梦》,现代戏剧《雷雨》、《离婚》,当代小说《方珍珠》、《我们曾经相爱》(上篇)、《新结婚时代》等作品中男女两性对语气词的使用情况的全面彻底的调查与定量统计分析,不仅以精确的数据统计表说明了女性在运用语气词方面确实与男性不同的结论,而且总结概括了这样一条规律:女性长期以来在语气词使用方面有偏爱“啊”、“罢/吧”的倾向。对此,作者从理论上阐释说:“女性对于语气词‘啊’、‘罢/吧’的长期偏爱,是女性社会属性在女性话语中的体现。同时,它也是女性在表情达意时为遵守‘求谐’与‘柔化’原则而做出的必然选择。”作者指出:“从语法学的角度来看,语气词‘啊’与语气词‘罢/吧’是不同的词语,但二者却具有非常相似的修辞效果。即语气词‘啊’能通过增添舒缓、亲切的语气,从而使话语具有柔美的色彩。而语气词‘罢/吧’则重在弱化祈使句中的‘命令’语气,增添‘商议’的口气,有意减少话语对他人言行举止的强制性,强调对方的可选择性、自主性,从而体现对听话人的尊重,使话语的表达更为礼貌、柔和。可见,语气词‘啊’和‘罢/吧’具有一致的修辞功效:即能柔化语气,增进和谐的人际关系。”这种修辞规律的概括与理论阐释,是发前人所未发,是作者通过独到的研究视角与路径对女性修辞中语气词的使用进行深度研究与观照的结果。对于句类的研究,也是如此。可见,独到的研究视角与正确的路径选择,确实是作者在女性修辞研究中能够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关键所在。

在研究方法方面,本书归纳法、演绎法与定量统计分析法并用,特别是定量统计分析方法的使用,最为成功,这也是本书所提出的许多具有独创性质的观点显得可信、可靠,具有权威性与科学性的根本原因所在。如第四章第二节“女性在词气词使用上的修辞表现及修辞学阐释”,在论及女性对祈使句的使用时,作者指出:“不管在什么时代背景下,两性在祈使句的使用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男性使用祈使句的频次要高于女性,

男性使用祈使句的频次基本保持在女性的两倍左右”。对此，作者进行了这样一番理论阐释：“两性在祈使句使用频率上的差异充分反映了二者在发出祈使句时自我预设不同。即从整体来看，女性在交际时倾向于把自己置于接收者、服从者的地位上，习惯接受与听从他人的指令，而将对他人发出要求、命令看作失礼的不得体行为。而男性则整体上较为习惯支配他人，向他人发出指令。”作者认为“两性的这种差异，追根究底，乃是源于二者在社会文化制约下的性别定位与性别气质上的区别”，因为“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女性一直处于依附的地位，经济上缺乏独立性，基本被排挤在社会政治活动之外，其分工的局限性以及发展的弱势导致女性的存在价值长期被误读和被忽视。汉民族文化背景下的女性是一个‘卑弱’的群体，她们被界定为必须具有柔和、顺从、贤淑等品质。由于长期处于弱势的地位以及性别气质中的柔顺因素，这就使得女性在交际中以遵从他人为礼貌，而不善于向他人发出指令，尤其是向男性发出指令。与之相反，相比女性而言，生活在男权文化背景下的男性显然比女性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发号施令权，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往往一有机会便会对他人颐指气使，最不济的男人也能在妻儿面前拥有决策与命令的权利。因此，一般而言，男性在发出祈使句时比女性拥有更为肯定、自信的自我预设，他们比女性拥有更强的向他人发出指令的动机，因而在祈使句的整体使用频率上也就远高于女性。”这番理论阐释，一读便让人有一种醍醐灌顶、茅塞顿开的感觉，非常有说服力。但是，这种观点却是在任何修辞学教科书中都找不到的，在任何女性学的学术著作中也是找不到的。那么，我们对于作者的这番理论阐释为什么这样笃信不移呢？因为这个理论观点的提出不是凭空臆造，而是建立在作者扎实确凿的定量统计分析的一系列数据基础之上的。如果作者没有确凿的统计分析，没有具体的数据基础，岂敢说“男性使用祈使句的频次要高于女性，男性使用祈使句的频次基本保持在女性的两倍左右”。而不敢说这句具有定论性的话，上述这番理论阐释又立足于何处？可见，本书中许多有创见性的观点之所以能够让人信服，关键还在于作者在研究女性修辞问题时，始终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数据来说话的原则。换言之，科学的研究方法是该书理论创新得以成立的坚实基础。

作为一部开创性的学术著作，谢元春博士的《女性修辞研究》所达到的学术研究高度与深度，都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但是，从理想化的角度看，如果全书篇幅许可，或是作者研究精力足够的话，书中可以再选择一个微观方面的问题予以深入探讨，以期与书中原有的语气词与句类的微观研究与定量统计分析相呼应，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这样，就中国人的心理来说，可能会觉得“女性修辞研究”这座大厦的基础更加稳固些。当然，这只是一个理想化的目标。事实上，每一项学术研究都不可能一次性穷尽所有要论及的方面。如果这样，就没有学术研究中“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的说法了。

吴礼权

2014年2月28日于复旦园

目录

序

导言 (1)

第一章 绪论 (6)

第一节 女性修辞研究概况 (6)

一、国外相关问题研究概况 (6)

二、国内相关问题研究概况 (7)

第二节 本书的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12)

一、本书的研究目标 (12)

二、本书的研究内容 (12)

第三节 本书的研究方法和语料来源 (15)

一、本书的研究方法 (15)

二、本书的语料来源 (16)

第二章 女性修辞概说 (21)

第一节 女性的“性别”内涵 (21)

一、女性的生理性别 (22)

二、女性的社会性别 (24)

第二节 影响女性修辞的因子 (28)

一、性别：影响女性修辞的关键因子 (28)

二、地域·时代·具体情境：影响女性修辞的情境因子 (33)

本章小节 (38)

第三章 女性修辞原则 (39)

第一节 合目的性：女性修辞的“求谐”原则 (41)

一、“求谐”原则是“忍”文化传统的投射 (42)

二、“求谐”原则是“礼”文化精神的传承 (45)

三、“求谐”原则是“和”文化价值的实践 (48)

第二节 合规律性:女性修辞的“柔化”原则	(50)
一、“柔化”原则是汉文化宗法制度对于女性的伦理要求	(52)
二、“柔化”原则是汉文化“阴阳刚柔”观的折射	(54)
第三节 女性遵从“求谐”原则与“柔化”原则的层次性	(56)
本章小节	(58)
第四章 语气词的使用:修辞原则制约下的女性修辞表现之一	(59)
第一节 概述	(59)
一、语气词的修辞学研究意义	(59)
二、研究现状及其他	(61)
第二节 女性在语气词使用上的修辞表现及修辞学阐释	(63)
一、各主要语气词在两性话语中的使用情况及修辞学阐释	(64)
二、两性话语同一句类中语气词的使用情况及修辞学阐释	(111)
三、女性修辞在语气词使用上的“修辞表现”是遵循修辞原则的产物	(115)
本章小节	(126)
第五章 句类的使用:修辞原则制约下的女性修辞表现之二	(129)
第一节 概述	(129)
一、句类的修辞学研究意义	(129)
二、研究现状及其他	(130)
第二节 女性在句类使用上的修辞表现及修辞学阐释	(131)
一、明清、现代、当代作品各主要人物句类使用情况的统计	(131)
二、两性话语句类使用上的修辞表现及修辞学阐释	(132)
本章小节	(155)
第六章 “阴柔”之美:修辞原则制约下女性修辞建构的美学特征	(157)
第一节 女性的“阴柔”之美与汉民族文化	(158)
一、“阴柔”体现了汉文化对于女性外在容颜的审美要求	(159)
二、“阴柔”体现了汉文化对于女性道德品质的审美判断	(161)

第二节 女性修辞“阴柔”之美的构成因子	(162)
一、对于细音的偏爱赋予了女性修辞娇柔的语音面貌	(163)
二、委婉语的高频使用与詈辞的低频使用让女性修辞既柔且雅	(166)
三、聚焦日常琐事与人伦关系的修辞话题使得女性修辞温和而婉约	(172)
第三节 “阴柔”之美的时代性：女性在遵从修辞原则上的层次性的折射	(177)
本章小节	(181)
第七章 和谐价值：修辞原则制约下的女性修辞价值追求	(183)
第一节 女性修辞的价值何以被误解与被忽视	(184)
一、对女性价值的轻视是女性修辞的价值未能被科学认识的根本原因	(184)
二、充满男权主义色彩的判断标准导致女性修辞价值的判断有失公允	(188)
第二节 女性修辞的价值认识	(190)
一、女性修辞的价值的存在基础	(190)
二、和谐价值：女性修辞的突出价值所在	(193)
第三节 对当代女性修辞如何实现和谐价值最大化的思考	(208)
一、女性修辞新变化及其对女性修辞和谐价值最大化的影响	(210)
二、女性修辞的和谐价值如何得以最大化实现	(216)
本章小节	(218)
第八章 结语	(221)
参考文献	(227)
后记	(236)

导言

修辞，是人们为实现某一特定交际目的而对语言诸要素及其表达方式进行选择、调适的语言活动。女性修辞，则是女性根据特定的交际目标，并结合自身性别角色定位，而对语言诸要素及其表达方式进行选择、调适的语言活动。修辞既是人们的一种语言活动，修辞主体自然就是修辞活动中的主要决定要素。因此，修辞主体的性别、个性、学识与修养等都会对其修辞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女性作为一个特定的性别群体，在生理、心理等方面固然与男性有所不同，但更重要的是，女性接受着与男性迥异的社会文化与性别模式的塑造和定位，使得女性自然表现出明显地异于男性的个性气质。这种个性气质投射到女性的言语行为中，使得女性为实现交际目的，不得不去遵循着一定的修辞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女性修辞富于性别特质的表达方式、交际策略、话语风格等，并在现实生活中发挥其独有的价值。

在中国社会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女性修辞一直未能引起足够重视。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源于作为修辞主体的女性自身价值没有得到充分认可。众所周知，汉文化背景下的中国女性长期充当着男性的附庸，她们地位低下，社会权利不能完全获取，个人能力的发展受到严重局限。正因为如此，女性的价值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局限在传宗接代的生理功能上，她们的社会文化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与之相应，女性修辞的价值或曰重要性自然也难以得到关注。另一方面，源于缺乏公正的价值判断标准。现有的价值判断往往以男性修辞的标准为标准，以之评判女性修辞的优劣，就必然使得在修辞方式、修辞目的等很多方面都异于男性修辞的女性修辞，在这种并不公正的价值判断下，被贴上了琐碎、无用等带有负面印象的标签，使女性修辞内在的独特价值难以得到肯定、挖掘。正因为有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女性修辞的价值长期为人所忽视。中国历代文献典籍里很少有关于女性话语的记载，便是鲜明的体现。即使是在今天，人们在评价女性话语时，还是常常持不屑与轻视的态度。至于以女性修辞为对象的专业性研究，更是很长一段时间以内都是学术

研究的盲点。

而事实上,以客观、公正的态度来看,女性修辞是有其独到而不可替代的价值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首先,从哲学的视角来看,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包含有内部的矛盾性,矛盾双方处于对立统一的关系之中。男性修辞与女性修辞作为人类两种不同性别群体的话语形式,自然也不会例外。比方说,男性修辞通常表现出率直、阳刚的风格,女性修辞则大多表现出柔和、文雅的风格。从两性修辞之间的相异点来看,男性修辞与女性修辞之间是相互对立的。但是,它们之间又存在着密切的不可分割的关系,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的话语形式,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富于“阳刚”之气的男性修辞能在某些场合弥补女性修辞特点的不足,具有“阴柔”之美的女性修辞特点也能发挥出男性修辞所不能及的作用。倘若缺少了两性修辞中的任何一种,那么我们的语言世界将会变得苍白,人与人之间的交际交流也将遇到更多阻碍。可见,女性修辞的价值有其存在的哲学基础。其次,从美学的视角来看,男性修辞与女性修辞表现出了两种不同的美学特质。男性雄浑、矫健的“阳刚”之美和女性柔和、温婉的“阴柔”之美,分属两种不同的审美形态,但彼此之间并无优劣之分,而是各有其价值。王国维就曾说过:“境略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①意谓在美的世界中,没有等级。美虽然有不同的范畴,体现为不同的性质,但没有任何价值判断上的优劣高下。因此,从美学的角度来看,女性修辞表现出的“阴柔”之美与男性修辞表现出的“阳刚”之美只是人们在审美过程中划分出来的类型而已,其间并没有高下优劣的区别。再次,从现实生活实际层面来看,柔和、温婉的女性修辞比男性修辞能更有效地满足听话人的心理需要,从而有助于化解人际摩擦、维护友好的人际关系,对实现家庭的稳定、社会的和谐都具有极其突出的价值。

正因为女性修辞具有其独到的价值,因此女性修辞的研究理应成为修辞学研究中的重要部分。而从目前对于女性话语的研究情况来看,关于女性话语、女性修辞的研究还有很大的开拓空间。基于此,本书拟以女性修辞中的诸要素为研究对象,并着重以女性修辞在语气词以及句类上

^① 王国维著,刘锋杰、章池集评,人间词话百年解评[M].合肥:黄山书社,2002:56